

译者的适应和选择： 影视翻译研究

影视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化意识、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多元文化意识，适应影视语言的特殊性、影视翻译的技术制约因素、目的语文化的审美习惯、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及赞助人的要求，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才能真正让影视作品成功走上国际市场。

谢红秀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中国·成都

本书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WJH16）；湖南省
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项目编号：XSP17YBZC073）的研究成果。

译者的适应和选择： 影视翻译研究

影视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化意识、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多元文化意识，适应影视语言的特殊性、影视翻译的技术制约因素、目的语文化的审美习惯、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及赞助人的要求，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才能真正让影视作品成功走上国际市场。

谢红秀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影视翻译研究/谢红秀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504-3236-9

I. ①译… II. ①谢… III. ①影视艺术—翻译—研究 IV. ①J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259 号

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影视翻译研究

谢红秀 著

责任编辑:李晓嵩

责任校对:田 园

封面设计: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张姗姗

责任印制:朱曼丽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ej.com
电子邮件	booke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0.6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4-3236-9
定 价	58.00 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前言

影视作品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之一，承载着国家形象、价值观念、精神和文化等元素。影视翻译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媒介，不但可以让观众尽情地领略异国风土人情，而且对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有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生产及引进了大量的影视作品，影视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势不可挡的影视文化。一方面，引进和欣赏外国影视作品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和沟通，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文化的重要窗口和途径；另一方面，我国大量出口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提高华语影视作品的翻译水平，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影视作品要更好地打开海外市场，必须提高翻译水平，保证以地道的翻译来降低“文化折扣”，这不仅要完成忠实、通顺的字面翻译，更要在翻译的过程中，用海外观众喜爱和习惯的方式，让他们走进和了解影视作品背后的中国文化。然而，比起

历史较悠久的文学翻译，影视翻译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影视翻译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目前还未成体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影视翻译就是传递语言、文化上的最有效译文，使译语观众享受到源语观众同样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内涵。让观众在对话中听明白人物到底在谈论什么，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可是一旦在人物对话背后嵌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较为复杂的逻辑和情境，就往往很难用简单的话语轻易表达出人物本身想表达的意思，给观众带来理解上的困难！译者在影视翻译过程中要做出大量的选择、适应、保留和淘汰等操作，以适应另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文化，适应不同的导演，最后还要适应译语观众，这样的字幕翻译才能够被接受。作为外语翻译工作者，探讨影视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适应文化全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以产出整体适

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字幕，可以让本国影视作品在与各国影视作品的对决中尽显民族魅力，为本国文明的传播提供良性载体。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综述国内影视翻译的历史及国内外影视翻译研究现状，指出影视翻译研究的空白之处及从译者的适应和选择角度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第二章分析影视翻译的基本特征，总结其与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及其独特性；进一步审视和验证各种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在电影翻译这个特殊领域的可操作性；介绍了两种常见的影视翻译种类：配音和字幕。第三章介绍了古今中外对“适应”和“选择”的论述，综述了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胡庚中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及译者的主体性。第四章研究了影视译者适应和选择的因素，分别从片名、文化专有项、修辞等方面来探讨译者的多维适应与选择对于电影翻译的重大实践意义，充分强调译者在影视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影视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文化全球化等翻译生态环境与优化

选择翻译方法产出“适应选择度”译文的过程。第五章分析了中国影视作品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未与中国影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步的原因，总结华语电影“走出去”存在的痛点，对华语电影“走出去”之路提供建议，探讨翻译影视人才培养路径。

影视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化意识、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多元文化意识，适应影视语言的特殊性、影视翻译的技术制约因素、目的语文化的审美习惯、观众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以及赞助人的要求，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才能真正让影视作品成功走上国际市场。

谢红秀

2017年9月

目录

第一章 国内外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 1

第一节 我国的影视翻译历史 / 1

第二节 国外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 6

第三节 国内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 10

第二章 影视翻译的基本特征和种类 / 18

第一节 影视翻译的基本特征 / 20

第二节 配音 / 22

第三节 字幕 / 27

第四节 进口影片的配音和字幕问题以及对策 / 32

第三章 适应选择以及译者理论概述 / 40

第一节 古今中外译界对“适应”与“选择”的论述 / 40

第二节 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 / 42

第三节 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 43

第四节 译者的主体性 / 44

第四章 译者在影视翻译中的适应和选择 / 48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和选择的因素 / 48

第二节 影视片名翻译研究 / 60

第三节 影视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 / 75

第四节 影视翻译中的修辞问题研究 / 86

第五章 华语影视作品“走出去”之路 / 92

第一节 影视作品误译之殇透视 / 92

第二节 华语电影“走出去”的对策 / 99

第三节 影视翻译人才的培养 / 106

第四节 华语影视作品作为真实语料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 109

参考文献 / 113

附录1 2010—2016 年进口影片片名翻译 / 119

附录2 国际上获奖的部分华语电影中英文片名翻译 / 141

附录3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 / 144

后记 / 161

第一章 国内外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国文化交流的增多,影视作品作为当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形式,为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异域文化的窗口,也为中外交流架起了一道全新的友谊之桥,已成为各国和地区传播自身价值观念与表现自身独特文化形态的一种手段。

第一节 我国的影视翻译历史

我国的影视翻译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是多年来翻译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电影翻译早期就出现了包括影片说明、现场口译、“译意风”以及字幕翻译等翻译模式。1896年“西洋影戏”登陆中国,向中国观众展示了陌生化奇观和欧美文化,欧美电影逐渐成为中国有效、快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逐渐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也刺激着中国电影业的萌芽和发展。为帮助观众理解,早期的外国影片主要采用影片说明和现场口译等翻译方式。20世纪20年代后期,译配中文字幕的方法才基本成为电影翻译的主流方法。在字幕翻译流行了十余年后,1939年电影翻译有了一次较大的改进,出现了“译意风”。所谓“译意风”,就是在影院的座椅背后安装一个听筒,观众观看电影时使用听筒听“译意风”把电影中的外文翻译成中文。“译意风”从最初的翻译大概意思发展到根据剧情分角色演绎人物的性格和情绪,可以说是早期电影配音的雏形。1914年,华美影片公司拍摄的无声电影《庄子试妻》在美国上映,拉开了我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序幕。我国早期的电影公司非常注重电影字幕的翻译,他们意识到电影翻译是实现向国际宣传中国正面、客观的国民形象和中国灿烂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是政府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展现中国风貌的一个主要手段,同时也曾经是早期政府联合国内民众争取国际舆论的

工具。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影视翻译家，有孙瑜、周瘦鹃、洪深、包天笑、周剑云、程树仁、刘芦隐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孟广钧、许立群、刘迟翻译，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苏联故事片《普通一兵》成为我国影视译制的开先河者。在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极具技术魅力的译制片（译制片最早叫“翻版片”，又叫“翻译片”，是指将原版影片的对白或解说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后，以该种语言配音混录或叠加字幕后的影片）给国人带来了精神食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心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中苏关系密切时期，俄语影片在20世纪我国进口电影中占了最高的比重，涌现出萧章、尹广文、刘迟、陈涓、冯志刚、富澜、高莽、江韵辉、夏衍、王成秋、毛信仁、孟广钧、张开、徐立群、李小燕、瞿白音、蓝馥心、郑雪莱、傅佩珩、丽尼与田大畏等一大批影视翻译家。主要从事电影的英汉影视翻译的有陈叙一、潘耀华、宋淇、田汉、王慧敏、叶群、周国珍、李育中、陈尧米、郭建中、姜桂依、黎歌、齐锡玉、蓝馥心、傅佩珩等翻译家。他们地道的译制语言符合剧中人物性格、身份、职业，传神地表达出影片故事情节。

半个多世纪来，东北译制片厂制作了将近千部译制片，不少佳作获得文化部门和广电部门优秀译制片奖。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员和配音演员，首任厂长陈叙一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还是杰出的影视翻译家（翻译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如《音乐之声》《简·爱》《雾都孤儿》《巴黎圣母院》等73部外国电影）和导演（导演了74部译制片），他的翻译为译制片增色不少，丰富了汉语语言，甚至成为流行语言和流行歌曲，如《加里森敢死队》的“头儿”、《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悠着点”等。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译制片不仅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还得到国外原片导演及演员的赞赏，在国际上赢得了美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影视事业持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影视作品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专门负责外国优秀电视节目的引进、译制以及部分境外节目的采编工作。中央电视台一套根据影视节目类型陆续创办了《正大剧场》《国际影院》《名著名片欣赏》《世界影视城》《假日影院》等8个品牌特色栏目。中央电视台六套的佳片有约播放了很多优秀的国外电影。中央电视台八套的《海外剧场栏目》让观众了解各国人民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使大家足不出户便能感受浓烈的异域风情。目前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等是电视剧译制的主力军，近年来流行的外国电视剧几乎都是其译制作品。外国影视作品逐

步成为中国电视观众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扮演着传播世界优秀文化的桥梁的角色,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传播了异域文化,引领了新的潮流,打开了了解异域神秘世界的大门,深刻影响着几代人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电影中外国的风景、人文思想、科学技术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穿着打扮都吸引着人们,外国影片就如同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等科幻片拉近了我们与科学的距离。魔幻电影《指环王》三部曲的画面展现了新西兰的绝美风光,让人印象深刻,新西兰也由此成为人们眼中现实版的“中土世界”所在。《姿三四郎》极大地推广了日本柔道在中国的知名度。《唐顿庄园》让观众们了解到英国的百年庄园文化。

第二,普及了世界文学经典。我国引进的译制片中,世界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占很大比重。此类电影让世界名著在广大观众中得到普及,如《鲁滨孙漂流记》《汤姆·索菲亚历险记》《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这些由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拉近了世界文学经典与不同文化层次的普通大众的距离,让人们觉得文学经典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同时也激起了很大一部分观众阅读或重读原著的浓厚兴趣,进而促进了经典文学作品更广泛的传播。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最好的“联姻”。

第三,促进了官方语言统一的进程,丰富了语言表达方式。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是1927年美国拍摄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民国时期,有声电影的普及促进了官方语言的统一。1934年,民国政府出台了新的电影政策:“中国官话是唯一准许在电影中使用的语言,禁止方言。”这个政策消除了中国十几种方言和不计其数的各地土话造成的交流障碍。

此外,译者们细腻准确的经典台词让人们津津乐道,成为流行语言。《叶塞尼亚》里的“喂,当兵的!你不等我了吗”,《列宁在1918》中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坚韧不拔、顽强奋斗,让人们乐观地看待建设事业中遇到的困难,坚定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念。

又如电影《桥》里面广为传唱的经典插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英俊少年》的歌词“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都成为流行歌曲,引领时尚。

第四,培养了一批优秀翻译人员和配音演员。译制片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很多观众对童自荣、邱岳峰、毕克、尚华、刘广宁、李梓、丁建华等配音艺术家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比起配音演员,译制片的译者

们却鲜为人知，成为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但他们的工作对于译制片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译者是译制厂的专业翻译，有些则是高校外语教师或者其他外语专业人才，他们的翻译杰作至今仍然是广大影视爱好者的研究对象。

第五，给我国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外国优秀电影强大的叙事能力、精致的画面、先进的拍摄技术以及合适的演员选用都给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观念和技术方面推动了我国电影以及电影翻译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影视作品的同时，也将我国优秀影视作品输出至海外。早期电影翻译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商业翻译、中国民营电影公司与民国政府的合作翻译、民国政府主导的电影翻译以及国外政府机构或电影公司对我国影片的翻译。

第一种翻译类型是民营电影公司的商业翻译。在早期，令人惊奇的是很多民营公司在电影最初发行和放映时大多数都是加上了中英文双语字幕，注意海外市场的开拓，大规模的、自发的电影翻译现象说明早期的电影公司就具有国际视野。其目标观众不仅仅是国内观众，还有国内的外国观众以及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一方面，早期的电影公司一些出于爱国目的，觉得电影公司对中国国际正面形象的树立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商业利益驱使，欧美电影公司在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商业利益，刺激着中国早期的电影公司想吸引外国观众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由于早期的电影公司非常重视电影字幕的翻译，其对译者也是精挑细选，多采用精通英语的、留学归来的中国译者以及懂汉语的外国人担任字幕译者，如孙瑜、洪深、刘芦隐、朱维基等，他们中部分人甚至在电影中担任多重角色。洪深曾留学哈佛大学，创作了38部电影剧本，导演了9部电影；孙瑜曾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纽约电影摄影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导演和编导过6部经典电影。优秀的英文功底、数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对电影和电影制作的了解都保证了我国早期电影翻译的质量，因此早期电影翻译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保证了电影在国外市场的可理解性。

第二种电影翻译是中国民营电影公司与民国政府的合作翻译。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的《渔光曲》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影展并且获得第九名的荣誉就是民国政府指导民营电影公司电影翻译的典型，显示了国家政府管理机构对民营电影公司参与国际交流的管理。当时民国政府的电影管理机构及电影检查委员会对参赛影片进行最终选择，《渔光曲》《大路》《空谷兰》《春蚕》《重婚》《女人》《桃李劫》最终获得出国执照从而参赛，让国际电影界知道中国也有电影文化。这也是民营电影公司首次在电影传播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和深度。这种政府指导下的电影翻译译者主要是民国政府电影检查机构的官员，比如1935年去俄罗斯参加国际电影节的译者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民国政府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演员部管理主任。这些官方译者的任用保证了电影的翻译活动不偏离政府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宣传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交流的目的。

第三种是民国政府主导翻译的教育电影、新闻片以及抗日电影。民国政府教育电影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基础科学、社会科学、伦理规范和应用科学等各个领域。教育电影输出是民国政府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1935年，由民国政府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农人之春》参加比利时国际农业影片比赛会，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其译者皮作琼早年留法，学习农业，精通法语，熟悉法国历史文化，并且获得法国农业部土木工程司学位，他的翻译和现场解说，显示了翻译对中国电影进入国际电影节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国产片进入国际市场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除了教育电影，民国政府进行翻译输出的抗日电影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的国防意义，是抗击日寇、联合民众、振奋斗志的意识形态工具。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了大量的记录抗日战争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反攻》《抗战特辑》不仅在国内放映，还被送到国外，包括东南亚国家、苏联、英国、美国等，展示了中国抗战的决心与行动，有力宣传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热诚和忠勇，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物资援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海外观众和侨胞受到影片抗日爱国精神感染，纷纷慷慨解囊，支持抗战。

第四种是国外机构的翻译。1935年，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克林在华旅行时看到联华公司拍摄的《天伦》，想引入美国市场，最后取得联华公司授权，对《天伦》原底片和配音、字幕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与技术处理以符合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和审美需求以及适应美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片名《天伦》翻译成“*Song of China*”，让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派拉蒙影片公司在放映前一天，还在《纽约时报》的显著版面刊登了该报特约享誉美国的中国作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林语堂撰写的介绍中国电影的文章《中国与电影事业》，作为电影《天伦》的前奏曲。派拉蒙影片公司首先对电影结局进行了改写，中国版的《天伦》的结局是个悲剧，主人公在妻子、儿孙和众孤儿的默祷中死去，而美国版的《天伦》则是大团圆的结局。该部电影的翻译策略为异国情调化翻译，充满了东方情调，突显了中国的孝仁礼仪，比如原字幕“爸爸，请你饶恕我吧”，译者译为“Father, I humbly beg your forgiveness”，译者让本国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中国观众对伦理、孝义的强

调,吸引观众。如果说派拉蒙影片公司是为了吸引观众而采用异国情调化的方法,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电影翻译则是为了实施文化殖民主义而进行改译。1941年,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拍摄完成动画片《铁扇公主》,导演有意借助孙悟空的斗争精神鼓舞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是民间电影公司拍摄的爱国电影。1942年,该片在日本放映时,采取日语配音,减去故事情节10分钟,目的就是为了减弱影片中暗含的抗日呼唤,这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议。^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工作者首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国际影坛。1950年,我国共向外输出《中华女儿》《赵一曼》《白毛女》《光芒万丈》等10部长短影片,并且于同年7月参加了第五届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电影输出基本上是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

1966—1976年,国产片一律不准在国外放映,电影翻译工作几乎停止,这给我国的经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10年间,我国只向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罗马尼亚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了一部分“样板戏”影片。1976年后,通过一系列举措,电影业务逐渐恢复正常,走向正轨。1980—1992年,我国共向107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性输出长短影片近500个,同时我国影视作品开始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这个时期大部分电影的翻译都是电影公司请熟知的精通英汉双语的中国和外国译者翻译的。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就是澳大利亚的译者贾佩琳,她翻译了很多著名电影作品,比如张艺谋的《活着》和《英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梅兰芳》,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和《小城之春》,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她的翻译特点就是“让中文平易近人”。贾佩琳精彩的翻译帮助了很多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赢得国际奖项,如《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英雄》获得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节 国外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与历史较悠久的文学翻译研究相比,影视翻译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者的数量以及该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都相对

① 金海娜.中国无声电影翻译研究(1905—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较少。除了文学作品长期享有的经典学术地位以及影视翻译从业机会的有限性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影视翻译具有的不可逾越的特殊性。由于影视作品是声音和图像二维结合的产品,研究者并非单纯地进行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字文本的比较,而是要结合多种视觉和听觉因素对原作与译作进行对比。译制片是剧本翻译、配音演员、译制导演等多方人员集体创作的智慧结晶,剧本翻译是影响译制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非唯一因素。译者面对的并非是单一的文字文本,而是由图像、画面、声音、色彩等一系列特殊的表意符号融合而成的多重符号文本。译文受到传播过程中空间和时间的制约,因而影视翻译研究面临的难度和广度也较大。

对于影视翻译理论研究,西方在影视翻译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很多学者在影视翻译的理论建构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6年,福多(Fodor)出版的专著《电影配音:语音学、符号学、美学和心理学》(*Film Dubbing: Phonetics, Semiotics, Esthetics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首次从语音学、符号学、美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影视作品的翻译,提出电影译制要在语音、人物性格和内容三个方面达到同步。如今活跃在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是西欧的学者,他们在众多国际翻译期刊上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多篇影视翻译研究的文章以及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专著。影视翻译及其相关研究之所以在欧洲得到蓬勃的发展,与欧洲各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语言 and 文化的多元特征以及彼此在各个领域的密切交流息息相关。1995年,电影百年纪念的活动举办,影视翻译最终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995年以后,在欧盟的支持下,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更新,带来电子产品的迅速发展,客观上形成了研究影视翻译的有利条件,同时欧洲各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意识的增强,西方影视翻译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论文数量明显增加(Gambier, 2003)。虽然国外还没有学者研究华语电影翻译,但是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对国内的影视翻译研究大有裨益。早期的西方研究较多关注配音与字幕这两种方式在美学价值和翻译质量上孰优孰劣的问题(Fodor, 1976; Marleau, 1993; Gottlieb, 2001)。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并非只是简单的“译术”问题,而是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电影进口政策、本土电影强弱、译语观众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对于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都有过论述(Luyken et al., 1991; Danan, 1991; Goris, 1993; Kilborn, 1993; Diza-Cintas, 1999; Mera, 1999; Karamitroglou, 2000; Paolinelli, 2004)。在翻译策略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从翻译和文化角度结合文本分析、语用学、接受理论、关联理论等研究成果探讨配音和字幕翻译中的问题与策略。例如,电影